

伊斯梅尔·杰姆的欧亚主义 与后冷战时代 土耳其的外交转型^{*}

• 王佳尼

〔内容提要〕伊斯梅尔·杰姆是联合政府更迭频繁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任职时间最长的土耳其外交部部长（1997—2002），也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对其著述进行全面的梳理有助于理解当代土耳其外交的延续和变迁。在理念层面，伊斯梅尔阐释了后冷战时代土耳其欧亚主义的地缘范围和身份定位，为欧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在实践层面，伊斯梅尔尝试打造安全稳定的地缘环境，领导区域合作，从而平衡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非对称关系。达武特奥卢是伊斯梅尔之后土耳其又一位欧亚主义者，二者对周边外交、帝国历史和土耳其的身份定位有相似的理解，体现出伊斯梅尔思想在正义与发展党时代的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复合地缘战略’与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37）的阶段性成果。

续。整体而言，伊斯梅尔的欧亚主义契合了后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转型之需，并为当代土耳其外交的灵活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伊斯梅尔 欧亚主义 土耳其外交 达武特奥卢

伊斯梅尔·杰姆是土耳其社会民主左派代表，1997—2002年出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对土耳其欧亚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土耳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梅尔出版了大约21部著作和多篇论文，集中反映了他对土耳其内政与外交关系的理解和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深度思考。目前，学术界有关伊斯梅尔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从社会民主的视角阐释其政治思想，^① 或从欧亚主义的视角解读其外交思想。^② 同时，研究伊斯梅尔外交理念的学者主要是土耳其人，研究主题相对分散，相关论述缺乏系统性。实际上，伊斯梅尔的外交理念确保了冷战后土耳其外交的稳定发展，是土耳其承前启后的欧亚主义者代表，其温和的欧亚主义主张为土耳其

①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Ozan Örmeci, “A Turkish Social Democrat: İsmail Cem,” in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1 (2011), pp. 101–114.

② Veronika Torosyan, “Multi-faceted Eurasianism: A Comparison in Practice,” 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5 (2023), pp. 380–393; Suat Kınıklioğlu, *Eurasianism in Turkey*, (SWP Research Paper)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22); Özgür Tüfekçi, *The Foreign Policy of Modern Turkey: Power and the Ideology of Eurasianism*,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2017); Emre Erşen, “Turkey and the Eurasian Integration: Ideology or Pragmatism?” , in *Vestnik RUD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1 (March 2022), pp. 111–125; Emre Erşen, and Seçkin Köstem, *Turkey's Pivot to Eurasia: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对外战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从伊斯梅尔的生平时代和主要著作出发,对其外交理念进行了梳理,并将伊斯梅尔的外交理念与另一位颇具影响的欧亚主义者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思想进行了比较,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伊斯梅尔及其外交理念对土耳其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

一、伊斯梅尔的政治生涯及外交理念

(一) 生平与政治生涯

伊斯梅尔受西方教育的影响较大,他高中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①后前往瑞士洛桑大学求学,1981年获得巴黎政治学院硕士学位。毕业后,伊斯梅尔曾在《太阳》杂志社等多家有影响力的土耳其报社担任过编辑和专栏作家,还担任过土耳其记者联盟伊斯坦布尔分会主席。由于工作表现出色,他曾被共和人民党主席比伦特·埃杰维特任命为土耳其国有广播电视公司的总经理。在此期间,伊斯梅尔出版了《“转型时期”的土耳其(1981—1984)》^②等著作,对土耳其社会民主运动的诞生和发展进行了梳理,提出应与时俱进地调整土耳其的社会民主理念,这在当时的土耳其“左派”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土耳其1982年宪法禁止此前的政党参加政治活动,^③为了能

① 即后来的土耳其海峡大学(Boğaziçi Üniversitesi)。

② İsmail Cem, “Geçiş Dönemi,” in *Türkiyesi (1981–1984 Yılları)* (《“转型时期”的土耳其(1981—1984)》)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84)。

③ 1982年宪法规定,先前政党中的主席、总书记,以及其他各级官员,在10年内不得组建、加入或拥有新的政党,也不得作为无党派代表参与选举。详见: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Turkey], November 7, 1982,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b5be0.html> (上网时间:2024年3月25日)。

够参加1987年大选，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于1985年9月合并为社会民主人民党，由前社会民主党的埃尔达勒·伊诺努领导。社会民主人民党成立当天，伊斯梅尔在好友艾登·居万·古尔坎的邀请下加入了该党，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促进社会民主人民党的健康发展，伊斯梅尔借鉴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为土耳其社会民主人民党设计组织模式、制定发展计划，并撰写《障碍与对策：土耳其的社会民主》，^①以提高该党的理论水平。

伊斯梅尔尽管为社会民主人民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因在“反恐”和库尔德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而与该党渐行渐远。一方面，伊斯梅尔对社会民主人民党与库尔德分裂主义逐渐暧昧的关系严重不满。社会民主人民党本来是反对库尔德分裂主义的。1989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夫人丹尼尔·密特朗邀请伊斯麦特·伊诺努参加巴黎库尔德研究所主办的学术会议，伊诺努以该研究所与库尔德工人党“有染”为由拒绝了密特朗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开除了擅自参会的7名党内成员。此后，被开除的7人成立了人民劳动党。^②然而，1991年，伊诺努为加强社会民主人民党的政治力量，而与人民劳动党结成选举联盟，这在伊斯梅尔看来是对社会民主人民党坚定“反恐立场”的背叛，不仅有损该党的民主立场，而且会失信于选民。^③另一方面，伊斯梅尔逐渐失去社会民主人民党的领导权，

① İsmail Cem, *Engeller ve Çözümler: Türkiye’ de Sosyal Demokrasi* (《障碍与对策：土耳其的社会民主》) (İstanbul/Ankara: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② Ozan Örmeci, *Portrait of A Turkish Social Democrat: İsmail Cem* (Bilkent University, PhD Diss, 2011), p. 56.

③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

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179.

在其党内好友德尼兹·巴伊卡尔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伊斯梅尔开始支持巴伊卡尔与伊诺努争夺党内领导权，^①但3次竞选均以失败告终。伊斯梅尔与巴伊卡尔决定离开社会民主人民党，通过重建在1980年政变中被解散的共和人民党来实施新的社会民主转型方案。1992年9月9日，共和人民党召开大会，巴伊卡尔成为继凯末尔、伊斯麦特·伊诺努和比伦特·埃杰维特之后的第4位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但由于此时的共和人民党没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导致1992年重建以来出现过3种联系甚微甚至互不连贯的指导思想，分别是“新左翼”思想、“安纳托利亚左翼”计划，以及以世俗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指导思想。巴伊卡尔的独断和自大以及党内的权力斗争，不仅阻碍了共和人民党的发展，还导致伊斯梅尔在1995年底彻底退出该党。重建后的共和人民党虽然参与了议会选举，但未能获得单独执政的机会，只作为土耳其最主要的反对党活跃于政治舞台。^②

离开共和人民党后，伊斯梅尔于1996年加入了比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并于1997年开始担任外交部部长。直至2002年议会选举前，因为与埃杰维特理念不合，伊斯梅尔辞去了外交部部长职务并退出了民主左翼党。孱弱的土耳其联合政府也逐渐走向溃败的边缘，伊斯梅尔于2004年因身患癌症退出了土耳其政坛，2007年因病逝世。^③

①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180.

② 赵婷：《战后以来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执政参政状况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3期，第60页。

③ Ozan Örmeci, “A Turkish Social Democrat: İsmail Cem,” in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1 (2011), p. 102.

（二）伊斯梅尔外交理念的主要内容

伊斯梅尔外交理念的内容从纵、横两个方向贯穿土耳其的历史与当下、内政与外交，涵盖了历史文化、教俗关系、国家发展、国际形象，以及库尔德问题等多个层面。

首先，伊斯梅尔坚持认为奥斯曼帝国遗留的“多元文明特征”是土耳其制定灵活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① 伊斯梅尔认为土耳其的历史文化特征，是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奥斯曼文化”，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中，伊斯兰、拜占庭、突厥、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化元素因为“宗教宽容”并行不悖。^② 土耳其共和国应该将自己视为“所有这些文化的代表者和承载者”，“既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从而结束共和国建立以来“西方—东方”“宗教—世俗”“突厥—阿拉伯”之间的对立。^③ 伊斯梅尔上任伊始就表示，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曾经广阔的版图覆盖了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东、巴尔干、高加索等核心地区，土耳其要唤醒历史记忆，发掘其遗留的伊斯兰、突厥、基督教等文化要素，“对自己充满信心，不为自己的过去，即奥斯曼的遗留文化感到羞耻”^④，提升历史自信，克服以往与邻国交流过程中可能产生摩擦所带来的恐惧，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在当代地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2.

② İsmail Cem, *Türkiye’ de Geri Kalmışlı ğın Tarihi* (《土耳其的欠发达历史》)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70), p. 15;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51.

③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52.

④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
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37.

缘政治核心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拓展地缘政治深度。另一方面，在帝国遗留的文化资源的影响下，土耳其本应是一个拥有多种文化认同的国家，但“几十年来，任何带有‘东方’和‘阿拉伯’内涵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落后’的、‘不友好’的、‘不值得信任’的，应当逐渐摆脱这种误解，实现外交政策的平衡”^①。因此，伊斯梅尔认为，不能仅根据“西方”“伊斯兰”或者“突厥”等单一特定的文化特征来定义土耳其的身份，当代土耳其应继承并充分发挥奥斯曼帝国遗留的“多元文明特征”。但需要强调的是，伊斯梅尔对东方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走向西方的对立面，^②因为土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对西方国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土耳其应该通过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来提升和凸显自己在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从而使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更为密切。

其次，伊斯梅尔反对世俗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在国内政治领域中，他既反对政党为政治目的利用伊斯兰教，也反对“政治伊斯兰化”；在外交领域中，他并未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推行，而是将其视为土耳其拓展周边外交的有力支持。在教俗关系问题上，伊斯梅尔与经典“凯末尔主义”的主张不同：一方面，他认为奥斯曼帝国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因为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完全依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来统治帝国，而是根据社会经济需要来诠释宗教；^③另一方面，伊斯梅尔将“世俗主义”定义为对不同宗教、教派和非信徒的“共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69.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54.

③ İsmail Cem, *Türkiye’ de Geri Kalmışlığın Tarihi* (《土耳其的欠发达历史》)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70), p. 15.

同保障”，^① 因为世俗主义是民主的核心，若无世俗主义，就无法在政治、经济、宗教等各领域建立真正的民主，^② 他希望宗教事务委员会为国内所有宗教和教派提供服务，^③ 并逐渐将国家层面的宗教权力、权威移交给社会和教派；^④ 国家应该对不同信仰“一视同仁”，或至少在不同信仰之间保持客观中立，并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提供自由的发展环境。^⑤ 因此，伊斯梅尔支持不同信仰群体之间进行对话交流，反对审查和压制伊斯兰教。^⑥ 土耳其建国之初就将世俗主义写进了宪法，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层面实行政教分离，推行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伊斯兰教始终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伊斯梅尔本人也出生于所谓的“白色土耳其人”家庭，^⑦ 但他并未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现代化、民主化的阻碍，而是通过伊斯兰教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缓和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使伊斯兰教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助推器”。

最后，“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重要成果，土耳

① İsmail Cem, *Sol' daki Arayış* (《左派的探索》)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94), p. 168.

② İsmail Cem, *Sol' daki Arayış* (《左派的探索》)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94), p. 168.

③ İsmail Cem, *Sol' daki Arayış* (《左派的探索》)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94), p. 168.

④ İsmail Cem, *Sol' daki Arayış* (《左派的探索》)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94), p. 169.

⑤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 (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89.

⑥ İsmail Cem and Deniz Baykal, *Yeni Sol* (《新左派》)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2), p. 93.

⑦ “白色土耳其人”是土耳其著名社会学家吕弗尔·戈莱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位于城市的、持世俗主义立场的上层阶级，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因此也有权力决定何为文化。与之相对应的“黑色土耳其人”泛指被国家精英阶层所鄙视的所有人，也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主要是贫穷而虔诚的穆斯林。

其应借此塑造积极有为的地区形象和民主法治的国际形象。“土耳其模式”是综合了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与外交等诸多方面成功经验探索出来的一种国家发展路径。其中，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兼容被认为是“土耳其模式”的重要特色。^① 由于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政治上具备一定的西方民主特征，“土耳其模式”因此得到中东国家广泛认可和借鉴，土耳其也被西方国家当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模板”，从而提升了土耳其的软实力和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② 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伊斯梅尔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认为“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投票权，民主规范应该被传播到各个领域，包括家庭、政党、学校、清真寺和军营，社会各阶层都应应将民主规范内化”^③。并且，良好的民主化进程对内能够提升政府的威望和效率，在社会上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对世俗/宗教形成更民主、更宽容的理解，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对外能够改善土耳其的国际形象，有助于实现加入欧盟的政治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梅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出了自己对于库尔德问题的见解。^④ 在国内层面，伊斯梅尔与大部分土耳

①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02.

② 邹志强：《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42—43页。

③ İsmail Cem, “Geçiş Dönemi”, *Türkiyesi (1981–1984 Yılları)* (《“转型时期”的土耳其(1981—1984)》)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84), p. 17.

④ 伊斯梅尔对库尔德问题的理解主要来自他从事记者工作时期，对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的田野调查经历和经验。1970年6月，伊斯梅尔发表在 *Milliyet* (《国家》) 上的一系列文章“Acılı Do ğu” (《东部的伤痛》) 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伊斯梅尔在他的第一本著作 *Türkiye Üzerine Araştırmalar* (《土耳其研究》) 中出版了该系列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的形式多是新闻报道和媒体评论，未能系统展现伊斯梅尔的相关理论，但基于他对该地区的观察与分析，使其成为较早描写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著作之一。

其人一样，认为库尔德人是土耳其共和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一部分库尔德人强烈反对将自己定义为少数族裔，但他们仍然要求土耳其政府根据欧盟的标准为其提供本该属于少数族裔的权利。^① 并且，“土耳其的穆斯林之间没有区别，他们之间不存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只属于非穆斯林的宗教少数”^②。因此，伊斯梅尔反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但捍卫库尔德人的公民权利，^③ 认为应该通过提供土地改革、经济发展以及保障库尔德人在文化、民主与自由方面的个体权利来解决库尔德问题。^④ 首先，土耳其政府应当通过废除紧急状态令和改善当地人落后的生活方式，使库尔德人民成为国家的主要公民，^⑤ 而不是忽视甚至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其次，土耳其政府应加强东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库尔德人的生活环境，提升当地的社会经济能力。^⑥ 最后，土耳其国防部应该在阻止库尔德工人党武装（PKK）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积极与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进行协调，从而制订出详细的行动计划。^⑦

① Ozan Örmeci, *Portrait of A Turkish Social Democrat: İsmail Cem* (Bilkent University, PhD Diss, 2011), p. 236.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105–106.

③ İsmail Cem, *Türkiye Üzerine Araştırmalar* (《土耳其研究》)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70), p. 25.

④ “SHP’ de ‘YEN İ SOL’un Türkiye Programı,” (社会民主人民党“新左派”的土耳其纲领) Resmi Tarih Sivil Arayış: Sosyal Demokratlarda İdeoloji ve Politika, (İstanbul: Metis Yayınları, 1991), pp. 238–239.

⑤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 (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22.

⑥ İsmail Cem, *Türkiye Üzerine Araştırmalar* (《土耳其研究》) (İstanbul: Cem Yayınevi, 1970), p. 14.

⑦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 (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54.

因为伊斯梅尔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库尔德公民进行了区别对待,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属于“恐怖主义”,不应对其有任何同情态度,要坚决对其进行军事打击。^①他认为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对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应以公民为导向,只有在国家和政府得到当地公民支持的情况下,库尔德问题才有可能解决。^②在国际层面,伊斯梅尔承认外部势力支持了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恐怖主义,也是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导致了库尔德问题,^③但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也只能是土耳其的内政问题。^④值得一提的是,在任期间,伊斯梅尔和埃杰维特领导下的联合政府成功抓捕了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

二、伊斯梅尔外交理念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冷战开始后,土耳其作为北约国家,其外交政策一方面以美国中东政策为基准,侧重于自身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以抵御苏联“共产主义威胁”为主要目的。但是,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在外交上失去了明确目标和清晰规划,也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后冷战时代做好准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伊斯梅尔担任外交部部长,他依据冷战后地缘战略环境的新变

①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p. 178 - 179.

②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47.

③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23.

④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32.

化,在外交领域各方面都采取了更为务实、渐进的政策,反对在外交理念上的教条主义,并强调土耳其的现代性和理性特征。

(一) 打造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急于填补苏联在中东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中东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问题也伴随大国干涉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特别是库尔德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甚至国家安全,土耳其由此开始重视打造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出现了国际化趋势。80年代末,55000名库尔德人从伊拉克逃到土耳其,^①在土耳其激起了一阵库尔德民族意识,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结越来越明显。同一时期,在法国总统夫人丹尼尔·密特朗的参与下,欧洲也出现了支持库尔德人的运动。^②随后,1991年,海湾战争和伊拉克北部问题的发展成为库尔德问题国际化的转折点。海湾战争后,近50万名库尔德难民涌入土耳其,^③迫使土耳其政府决定对语言问题和文化权利进行新的政策安排。同年,土耳其国会通过了一个改革方案,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减轻了对他们的处罚,并且取消了禁止在私人领域使用库尔德语的规定。^④同年,土耳其还通过了一部《反恐怖法》,规定禁止举行不利于国家、民族和领

① Meliha Benli Altun ıřık and Özlem Tür, *Turkey: Challenge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3.

② Nicole Pope and Hugh Pope, *Turkey Unveiled – Atatürk and After*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1999), p. 261.

③ Meliha Benli Altun ıřık and Özlem Tür, *Turkey: Challenge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3.

④ Nicole Pope and Hugh Pope, *Turkey Unveiled – Atatürk and After*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1999), p. 266.

土统一的宣传、集会和游行等活动。^①“库尔德分离主义”逐渐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在此背景下，伊斯梅尔表示坚决反对所谓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或“库尔德分离主义”。他断言，正是西方政治精英“别有用心”，通过支持或忽视基于种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才导致库尔德工人党的不断壮大以及1987—1997年库尔德工人党针对土耳其发起的多次恐怖袭击。^②伊斯梅尔从地方行政官员的限制性、压迫性和歧视性行为，地区的封建经济结构，政府错误的地区政策，以及西方国家对库尔德人的支持等方面分析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成因，认为库尔德问题不是西方国家声称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问题，土耳其可以在民主、合法的范围内解决国内有关库尔德问题的争议，同时坚决反对任何支持“库尔德分离主义”的国家及其立场。^③1998年，在土耳其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土耳其与叙利亚签订了《阿达纳协议》，叙利亚政府承诺不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在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活动，如有必要，土耳其军队可以在土叙边境5公里范围内进行越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反恐”行动。1999年，土耳其情报部门在希腊驻肯尼亚大使馆附近抓捕了失去叙利亚政府庇护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库尔德问题一直是欧美国家诟病土耳其民主改革的要害，西方政坛和媒体长期以来的误解和带有偏见的报道，助长了库尔德工人党基于种族的“恐怖主

① Meliha Benli Altun ışıık and Özlem Tür, *Turkey: Challenge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53.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03.

③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 (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22.

义分裂活动”，导致西方大众舆论充满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同情。因此，伊斯梅尔不断警告西方政治家，“过分强调民族和族裔以及种族政治，将会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引发灾难，巴尔干半岛发生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灭绝事件正是因此造成的悲剧”^①。另外，在伊斯梅尔的推动下，土耳其还与以色列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继续在中东地区奉行和平与平衡发展的外交政策，发展与该地区所有国家，特别是与土耳其有历史和宗教联系的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国际组织方面，土耳其继续发挥欧洲安全组织明斯克小组^②和黑海经济合作组织^③的平台作用，帮助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展开对话，努力解决“纳卡争端”；领事保护方面，土耳其成立了“海外公民高级理事会”，改善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人社区的生活状况，支持他们在巴尔干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④伊斯梅尔充分认识到了安全、和平与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外交战略实施，以及维持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作用。

（二）领导区域合作互助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意味着土耳其抵御苏联和作为军事缓冲区的战略地位下降，西方世界转而开始寻求与东欧国家发展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06.

② 欧洲安全组织明斯克小组，是1992年在俄罗斯倡议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组织前身）成立了由12国组成的明斯克小组，俄罗斯、美国、法国为共同主席国。自此，有关纳卡问题不同级别谈判在明斯克小组框架内陆续举行。

③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又称黑海经济合作计划，简称黑海经合组织（BSEC），1999年，在土耳其的倡议下由11个黑海沿岸国家共同成立，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

④ 详见：Hüseyin Bağcı,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Strategic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Foreign Policy Issues in the 55th Government Program Under Mesut Yılmaz) in *Information on Security Policy*, No. 5 (1998), pp. 2–15.

盟友关系，土耳其不得不独自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压力，这迫使土耳其重新思考自身的地缘政治定位。首先，土耳其在西方国家中的战略地位下降，需要寻求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作为自身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其次，美苏对峙结束后，土耳其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对土耳其的安全保护大不如前，迫使土耳其开始发展自身的外交战略、拓展外交空间，首要的就是改善与周边中东国家间的关系。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历史、宗教和文化特质上与土耳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能源资源丰富，有助于土耳其进一步发挥能源枢纽的作用，提升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伊斯梅尔认为“在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广阔市场的加持下，21 世纪的欧亚大陆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土耳其不应仅满足于成为东西方的桥梁，而应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能源枢纽”^①。1998 年 10 月，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签署了支持建立石油运输管道的安卡拉宣言，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的建设提上议程；与此同时，在土耳其的推动下，1999 年 5 月，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 11 个黑海沿岸国家，共同成立了“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促进了黑海地区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1999 年 11 月，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又签署了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建设协议，以帮助输送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此外，土耳其不断强化与该地区的文化和宗教联系，分别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和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设立了土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42–43.

土耳其文化中心, 提供近万份留学奖学金、培训当地外交官等; 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也向当地派遣专门的宗教人员, 并向当地宗教管理部门派发宗教书籍。值得注意的是, 伊斯梅尔还重视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通过签订军事合作协议等方式, 向当地提供军事和反恐培训课程, 援助军事装备等。^①

在伊斯梅尔看来, 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因素, 土耳其应该与中东各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多边关系, 拒绝简单的“伊斯兰—世俗”“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格局,^② 特别是在敌对国家之间保持平衡, 反对各方通过暴力解决争端, 竭力追求和平解决方案。伊斯梅尔一方面通过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时任美国国务卿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施洛姆·本-阿米的私人友谊调解巴以关系,^③ 另一方面也努力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平衡。土耳其与以色列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 签订了“国防工业合作”和“军事训练”等相关协定,^④ 在贸易、科技、军事等方面展开合作。

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是土耳其能源枢纽的重要支点, 也是土耳其历史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支撑。伊斯梅尔认为, 在上述地区的政策目标应当包含四个方面: 一是援助并支持该地区新兴国家的建设, 二是支持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 三是帮助这些国家融入国际社会, 四是在互利共赢和主权平等的基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82.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17–20.

③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 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10.

④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87.

础上积极发展双边关系。^① 土耳其通过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从而在区域合作与互助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土耳其能源枢纽战略的实施，提升土耳其的外交自主性。

（三）与西方国家发展“利益对等”的外交关系

在奉行“亲西方”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土耳其被用来对抗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服务于西方国家的中东战略。然而，伊斯梅尔担任外交部部长后，表示将抛弃以往出于联盟或友谊关系而做出不对等牺牲的做法，提出土耳其要以“利益对等”为原则，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②

首先，美国一直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冷战结束，“现实政治和共同利益”逐渐取代了冷战时期以“地区安全的相互依存”为特点的土美关系。冷战时期，土耳其与美国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以对抗苏联。冷战结束初期，土美之间仍然是以军事合作为中心，带动政治、经贸和文教领域的全面合作，土耳其继续疏远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方面，土耳其开始通过历史、宗教和文化联系发展与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关系，特别是借力上述国家实现土耳其“能源枢纽”的目标，从而在东西方外交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美国急于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在巴尔干、波斯尼亚、马其顿、科索沃、中东、海湾地区、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有重大利益关切，在阿以冲突、伊拉克

^① Ertan Efeğil, “Rationality Question of Turkey’s Central Asia Policy,” in *Bilg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No. 19 (2009), pp. 78–81.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3.

问题、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冲突，以及石油和能源等问题上表现活跃，不可避免地与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主导权上形成竞争。然而，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土美之间实力悬殊，尽管不同意美国对塞浦路斯和伊拉克的政策，但土耳其不得不继续加强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①特别是对土耳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②以及当时正在计划中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此外，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实力也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伊斯梅尔认为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坚实后盾。奥斯曼帝国末期，土耳其军队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不但在中东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约也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常规军事力量。^③虽然土耳其军方多次发动政变，严重损害了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民主改革的认可，但军队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和进步作用，曾被视为世俗主义政权和宪法秩序的捍卫者。伊斯梅尔认为，考虑到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环境，军队在打击和威慑恐怖主义中的作用也尤为重要。在他的建议下，土耳其国防部被授予了更高的权限，使其能够与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之间进行协调，共同讨论并制订打击恐怖主义的详细计划。^④土耳其共和国领土的主体部分在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72–73.

②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全长 1789 千米，是一条将 ACG (Azeri – Chirag – Guneshli) 油田所生产的原油运送至地中海沿岸的管道。该管道起点为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过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最后到达土耳其位于地中海的港口杰伊汉。

③ 慕小明：《发动政变的土耳其军队的前世今生》，《中国青年报》2016 年 7 月第 12 版，第 1 页。

④ İsmail Cem, *Gelecek İçin Denemeler* (《有关未来的文集》) (İstanbul: Can Yayınları, 1994), p. 154.

地中海东岸，地中海被欧洲视作内湖；北部扼守黑海海峡，黑海又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东临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冲突频发；西部领土在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和平时期土耳其是大国觊觎的战略要地，冲突年代则是竞相夺取的战略要塞，由此奠定了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和安全中不可动摇的地位。^① 因此，伊斯梅尔将土美关系描述为“必要的共生”。^②

其次，加入欧盟一直是土耳其深入与西方国家关系、提升国际地位、打通能源枢纽市场端的重要战略。虽然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做了诸多努力，但1997年欧盟国家与政府首脑峰会上通过的东扩议程中还是没有土耳其，土耳其也因此当年暂停了与欧盟的关系。随后，伊斯梅尔改变了与欧盟关系的逻辑，认为土耳其“能为欧盟提供什么”比“能从欧盟获得什么”的逻辑，更能够引起欧盟对土耳其的重视，^③ 从而改变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中的被动地位。伊斯梅尔反对将土耳其也定义为欧盟的“二流成员国”，^④ 也不愿把入盟作为独立于土耳其整体外交政策的愿景，而是以利益对等原则向欧盟提出要求：如果土耳其的候选国申请被驳回，土方将撤销入盟申请，并在有关塞浦路斯、希腊、人权、库尔德等重要议程上拒绝与欧盟进行谈判。^⑤ 虽然伊斯梅尔是土耳其入盟政策的坚决拥护者，但他认为1995

① 李秉忠：《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史林》2010年第4期，第174页。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77.

③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60.

④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05.

⑤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207.

年“关税同盟协议”不仅损害了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而且并没有换来欧盟的尊重，因此，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开始采取果断和强硬的立场。1999年底的赫尔辛基欧盟会议上，欧洲委员会承认并确立了土耳其欧盟候选国的地位，土耳其入盟进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0年以来，土耳其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与入盟章程相适应的计划和方案。2001年3月，欧盟通过了土耳其的第一个“入盟伙伴关系文件”，包含“哥本哈根标准”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土耳其据此提交了第一个“国家计划”，确定了实现“哥本哈根标准”的步骤，以及与欧盟成员国相一致的中短期优先事项。2002年底，在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上，欧盟决定在土耳其达到“哥本哈根标准”后可以开启入盟谈判。伊斯梅尔强调，“即使最终无法加入欧盟，土耳其也应该为了自身的发展尽量达到入盟标准”^①。

值得注意的是，伊斯梅尔担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期间，与当时的希腊外交部部长乔治·帕潘德里欧（1999—2004）为改善双边关系付出了许多努力。1999年夏天，土耳其和希腊地震频发，双方通过相互援助开展了“地震外交”，双边关系得到改善。2000年1月17日，乔治·帕潘德里欧正式访问土耳其，是1962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土耳其的希腊外长，伊斯梅尔公开表示“这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甚至是新的时代”^②。双方借此次会晤签署了一系列涉及旅游、环保、投资以及打击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协议。伊斯梅尔于2000年2月2日回访希腊，两国又签署了

①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
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09.

② Rhea Sourmeli, “Greek Minister Begins Official Visit to Turkey as Relations Improve,” *The Irish Times*, January 20, 2000,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greek-minister-begins-official-visit-to-turkey-as-relations-improve-1.235852> (上网时间：2024年7月8日)。

以科技合作、海上运输合作、加强经济合作、教育和文化为重点的双边协议，以及建立一个避免违反海关规定的框架协议。^①然而，遗憾的是双方始终未能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从“亲西方”走向“利益对等”，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自主性的重要开端。土耳其通过修复与中东国家关系、确立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主导权，为自身发展打造了安全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在此基础上，土耳其主张领导区域合作互助，通过能源资源和地缘优势，与地区国家共同建设“能源枢纽”，连接能源的生产地和消费端，再度使土耳其成为世界大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撑点，也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长远发展找到了新的立足点。

三、伊斯梅尔外交理念的影响

伊斯梅尔外交理念对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以来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重新审视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和冷战时期一直坚持的“亲西方”外交政策，而且确立了欧亚主义思想在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一）对土耳其欧亚主义的影响

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

^① 详见：Dış Basında Dışişleri Bakanı İsmail Cem' in Atina Ziyareti; 2 - 7 Şubat 2000 (外交部部长伊斯梅尔·杰姆访问雅典：2000 年 2 月 2 日至 7 日)，Ankara: Basın - Yayın ve Enformasyon Genel Müdürlüğü, 2000; Kaşif Eryalçın, “Türkiye ile Yunanistan Arasındaki Ticari ve Ekonomik İlişkiler,” (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Dışişleri Bakanlığı ғы Yayınları Uluslararası Ekonomik Sorunlar Dergisi, Sayı IX, Mayıs, 2003, <http://www.mfa.gov.tr/turkiye-ile-yunanistan-arasindaki-ticari-ve-ekonomik-iliskiler.tr.mfa> (上网时间：2024 年 7 月 25 日)。

国，是介于主张改革的“西方派”和主张传统的“斯拉夫派”之间，但又超越了二者的一种政治思潮。特鲁别茨科伊在1920年出版的《欧洲与人类》一书中首次使用“欧亚主义”一词；1921年8月，特鲁别茨科伊和萨维茨基在论文集《走向东方：预言及其实现——欧亚主义者之主张》中，正式提出了“欧亚主义”的概念，欧亚主义思潮正式诞生。^① 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是要弱化西方文明的一统权威，否认西方文明的普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世界文明的多元及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俄罗斯欧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古米廖夫，他也是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当今最受世界关注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家杜金和帕纳林等，都是在古米廖夫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杜金主张的新欧亚主义政治实践对俄罗斯政治影响深刻。新欧亚主义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从地缘、文明、国际现实利益斗争等多个角度界定了“新俄罗斯”，其目标是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摆脱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俄罗斯帝国梦想。^②

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还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过程中，俄罗斯的古典欧亚主义对土耳其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土耳其真正接触到欧亚主义是在苏联解体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一方面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获得发展并于1992年建交；另一方面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基于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联系，土耳其设想通过与这些中亚国家建立公路交通、能源和通信联系，形成

①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108页。

② 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108页。

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的土耳其势力范围。^①新欧亚主义借此进入土耳其，最先在左派中流行，后来对右翼民族主义者、中间派以及宗教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从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到土耳其欧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作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伊斯梅尔·杰姆对土耳其欧亚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冷战后土耳其欧亚主义的地缘范围，以及其对土耳其提升国际地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土耳其一直被视为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桥梁与纽带，伊斯梅尔认为，“土耳其在西欧到中国西部地区之间占据中心位置，应该在欧亚大陆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是土耳其的“欧亚特质”。^②在伊斯梅尔看来，冷战后的土耳其应当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特别是要利用“欧亚特质”制定更为灵活、理性、务实的外交政策，^③以重塑土耳其外交策略、提升土耳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使土耳其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国家”。^④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欧亚大陆在生产、信息和技术领域的一体化。伊斯梅尔表示：“下一个千年，大部分的经济发展将出现在亚洲，新能源和通讯走廊的出现正在印证这一事实。”^⑤土耳其应当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地缘优势，使土耳其再次成为欧亚

① James Finn et al.,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 Civil Liberties*, 1993 - 1994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4), p. 552.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67.

③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12.

④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20.

⑤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67.

连通的关键。其次，冷战后欧亚大陆的区域化发展为土耳其带来了政治机遇。在地缘上，土耳其同时是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等多个地区的国家，并且这些地区多为新兴经济体，土耳其应充分利用与这些新兴经济体之间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相似的文化特征，在与这些新兴经济体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主导多个地区的发展。伊斯梅尔认为：“经济进步主义与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新外交政策，将使土耳其乘着新的经济浪潮，从地区国家转变为世界国家。”^①

第二，厘清了土耳其在欧亚主义中的身份问题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伊斯梅尔外交思想特别指出，土耳其外交政策应该充分理解、接受并运用奥斯曼帝国遗留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经验，从而发挥自身独特的身份、文化和地理价值。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土耳其拥有悠久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和兼容并蓄的东西方文化资源，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长期的“亲西方”政策导致土耳其轻视甚至脱离了自身的历史文化根源，^② 以及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频频受阻，最终导致土耳其被限制在了“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这种二元对立迫使土耳其在东方与西方当中作出选择，将土耳其置于被动地位，并且这种二元对立夸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③ 伊斯梅尔强调，土耳其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不争的事实，土耳其既是欧洲的也是亚洲的，这正是土耳其的特权也是其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68.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 – 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3 – 4.

③ Ozan Örmeci, “İsmail Cem’s Foreign Policy (1997 – 2002)”, in *SDU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23 (2011), p. 224.

资产。^① 因此，土耳其应当从奥斯曼帝国寻找历史根源并汲取文化资产，利用其历史和文化优势，成为欧亚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② 土耳其应该以亚洲身份融入欧洲特质中，只有这样才能拓宽土耳其在中东、亚洲和欧洲的外交空间。

第三，伊斯梅尔为土耳其欧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在伊斯梅尔定义的欧亚范围内大约有 26 个国家，地缘位置决定了土耳其必须在地区凝聚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土耳其不仅不能将欧洲身份和亚洲身份割裂开来，而且要与欧亚范围内的所有地区国家保持团结。伊斯梅尔指出，几千年来，土耳其与欧亚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命运，这是欧亚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关系和政治合作的独特基础。因此，“在欧亚大陆广阔的社会政治地缘环境中，土耳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提供和平、稳定的‘欧亚秩序’……凭借历史和文化属性，以及欧洲和亚洲的‘特权身份’，土耳其将是欧亚大陆牢固的战略‘中心’”^③。另外，欧亚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贯通能源产地和能源消费市场的地缘优势，有助于土耳其成为新的“能源枢纽”，影响世界能源资源的再分配。欧亚大陆的安全与稳定有利于土耳其实现“能源枢纽”的战略目标，这既是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也是土耳其主导欧亚大陆的重要环节。

伊斯梅尔极为重视土耳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位置，在他看来，欧亚并不是欧洲与亚洲的简单相加，而是欧亚国

① Andrew Mango, "Book Review: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by İsmail Cem", i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No. 4 (2002), p. 2.

②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06.

③ İsmail Ce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Opening New Horizons for Turkey at the Beginning of a Millennium," in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 No. 1 (2002), p. 3.

家之间的深度链接。只有接纳了土耳其为正式成员国，欧盟才算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地区组织；^①而保持对不同身份和认同之间的凝聚力，可以提升土耳其对于西方世界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一点上，伊斯梅尔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者相似，他们把欧亚地区视为独立的大陆，并重视在欧亚地区国家之间建立合作。

（二）与达武特奥卢外交思想的比较

2002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上台执政，达武特奥卢被任命为总理首席顾问，并于2009年开始出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达武特奥卢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在他2001年出版的著作《战略深度：土耳其的国际地位》^②中，其“战略深度”主要以土耳其的地缘深度和历史深度为基础，可以概括为四个重要原则：以安全共识为基础的区域环境；与所有邻国进行积极主动的高层政治对话；促进地区经济相互依存；促进“多文化、多宗派的和平与和谐”^③。在达武特奥卢看来，历史深度指的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总能处于历史事件的中心，比如英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和土耳其都是具有历史深度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种族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等问题，而土耳其因为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所以拥有了庞大的地

① İsmail Cem, “Turkish Foreign Policy: Opening New Horizons for Turkey at the Beginning of a Millennium,” in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 No. 1 (2002), p. 4.

② Ahmet Davutoğlu, *Stratejik Derinlik: Türkiye’ nin Uluslararası Konumu* (《战略深度：土耳其的国际地位》) (İstanbul: Küre Yayınları, 2001) .

③ Özgür Tüfekçi, “Another Last Eurasianist: Davutoğlu’s Eurasianist Rhetoric,” in *Caucasus International*, Vol. 2, No. 3 (Autumn 2012), p. 105.

缘深度。这种地缘深度又使土耳其处于多个具有地缘政治影响力地区的中心位置。所以,“战略深度”要求土耳其积极参与周边所有的地区秩序。

首先,伊斯梅尔和达武特奥卢都重视与周边国家关系,但他们对“周边”范围的理解不同,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方式也不同。伊斯梅尔对“周边”的理解是建立在欧亚主义基础上的,其范围主要还是欧亚大陆国家。为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伊斯梅尔通过自己的私人友谊和穿梭外交来推动构建地区和平。伊斯梅尔与希腊前外长乔治·帕潘德里欧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①推动了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改善。伊斯梅尔还通过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前领导人阿拉法特的私人友谊,尝试与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接触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②“9·11”事件后,伊斯梅尔多次反对西方国家使用“伊斯兰恐怖主义”,并声称“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民族”,^③不应该用任何宗教或民族来描述或定义恐怖主义。对伊斯梅尔来说,土耳其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既是亚洲国家又是欧洲国家、既是伊斯兰国家又是世俗国家,^④土耳其应充分利用这些身份扩大国家利益,这才是土耳其外交政

① 土耳其总理办公室在2000年特地出版了小册子 *Dış Basında Dışişleri Bakanı İsmail Cem' in Atina Ziyareti* (《外国媒体对外交部部长伊斯梅尔·杰姆访问雅典的报道》) 和 *Dış Basında Yunanistan Dışişleri Bakanı Papandreu' nun Türkiye Ziyareti* (《外国媒体对希腊外交部部长帕潘德里欧访问土耳其的报道》) 介绍了媒体对双方互访活动的反应。

②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 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p. 214–215.

③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 伊斯梅尔传》)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40.

④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p. 19–20.

策最重要的优势。

达武特奥卢对“周边”范围的理解是建立在新奥斯曼主义基础上的，地缘范围不仅包含欧亚，而且覆盖了非洲，也就是“非洲—欧亚大陆”，是对奥斯曼帝国“地缘深度”的回应。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处于世界的中心，因为“德国虽然是欧洲的中心，但远离亚洲和非洲；俄罗斯虽横跨亚欧大陆，但对非洲鞭长莫及；伊朗是亚洲的中心，但与欧洲和非洲距离遥远。放眼全世界，只有土耳其地理位置绝佳，既是亚洲国家又是欧洲国家，并且能够通过东地中海直抵非洲”^①。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地缘位置优势的理解，类似于麦金德提出的“世界岛”概念。为此，达武特奥卢提出了与周边国家“零问题”的外交政策，即土耳其应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和纠纷，担当解决地区冲突的领袖角色，成为地区问题的解决者和地区秩序的塑造者，努力克服土耳其发挥全球影响力的障碍，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②

其次，伊斯梅尔和达武特奥卢都重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文化，但对历史文化的作用有不同认识。伊斯梅尔时期，宗教及历史文化是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纽带，共同的宗教和历史记忆是推动制定外交政策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之一，土耳其并未积极向外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主张，而是旨在以理性和世俗的方式利用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继承下来的历史文化资产，^③与周边国家建立更为友好的合作关系，最终目的是借此提升土

①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ssessment of 2007”, in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Winter 2008), p. 78.

② 胡雨：《土耳其“东向”外交与其深层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4期，第47页。

③ Barry Rubin, “Turkish Regime Changes Sides, West Averts Eyes,” https://ahl-alquran.com/arabic/show_news.php?main_id=10765 (上网时间：2024年4月15日)。

土耳其在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的话语权。

达武特奥卢则将土耳其的宗教及历史文化看作一种“文明归属意识”,并将共同的宗教和历史记忆作为外交政策本身,这与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的伊斯兰属性相辅相成。20世纪90年代,宗教事务委员会作为土耳其专门的宗教机构,其对外职能仅限于向巴尔干半岛和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国家提供宗教服务和指导交流。而达武特奥卢推行的多维外交,一定程度上将伊斯兰主义作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工具,特别是土耳其的宗教事务局,^①在正发党政府执政期间,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在传统职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在国内外执行特定意识形态的责任。^②宗教及历史文化在伊斯梅尔时期充当了外交关系纽带的作用,在达武特奥卢时期则成为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目标之一。

最后,伊斯梅尔的“世界国家”与达武特奥卢的“中心国家”相辅相成。伊斯梅尔指出,21世纪的土耳其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国家”,加入欧盟只是实现该目标的步骤之一。^③土耳其可以同时追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和成为欧亚大陆具有决定性的国家,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④因为土耳其拥有最具活力的经济、最先进的武装力量和运行时间最长的民主制度,“有最

① 杜东辉:《土耳其外交中的宗教行动者:宗教事务委员会》,《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十一辑),时事出版社,第177-201页;周国黎:《土耳其宗教事务管理局》,《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3期,第49-51页。

② 辛思思、刘义:《土耳其对外关系中的宗教管理委员会》,《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74页。

③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 205.

④ Can Dündar, *Ben Böyle Veda Etmeliyim: İsmail Cem Kitabı* (《这就是我应该说再见的方式:伊斯梅尔传》)(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8), pp. 205-206.

佳条件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并享受欧亚新秩序带来的机遇”^①。“世界国家”使土耳其摆脱了“桥梁”的定位,伊斯梅尔认为,土耳其作为“桥梁”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21世纪的土耳其还要进一步避免成为简单的“过境走廊”或“亚洲与欧洲的贸易和货物运输桥梁”,土耳其的基本职能将不再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接收能源、原材料和货物后运输并交付给另一方,相反,21世纪的土耳其应该努力发展成为“终点站”国家和“目的地”国家。^②

达武特奥卢“战略深度”和“零问题”的支柱是解决土耳其与周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所有问题,以此加强土耳其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从而接受土耳其作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国家”。作为“中心国家”的土耳其是一个有着多重区域身份认同的国家,“既是中东国家、巴尔干国家、高加索国家,也是中亚国家、里海国家、地中海国家,同时还是海湾国家和黑海国家”^③,很难简化出一个统一的特征来,^④其本质是泛突厥和泛伊斯兰主义。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作为“中心国家”,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潜力和作用,不仅要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而且要积极地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⑤在达武特奥卢担任外交部部长和总理期间,土耳其把2013年以来对联合国

①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68.

② İsmail Cem, *Turkey in the New Century: Speeches and Texts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Fora* (1995–2001) (İstanbul: Rüstem Publishing, 2001), p. 42.

③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ssessment of 2007,” in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Winter 2008), p. 79.

④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ssessment of 2007,” in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Winter 2008), p. 78.

⑤ Burhanettin Duran, “Türk Dış Politikasının İç Siyaset Boyutu: 2010 Değerlendirmesi,”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维度: 2010年评估》) in *Burhanettin Duran, Kemal İnat, and Mesut Özcan eds., Türk Dış Politikası Yılı 2010*, (SETA) (Akanra: Pelin Ofset, 2011), pp. 19–20.

体系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归纳总结为“世界不止五个国家”，特别提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没有伊斯兰国家代表这一问题。^①与此同时，达武特奥卢时期，土耳其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长，2012年，土耳其的官方发展援助与2011年相比近乎翻了一番，使土耳其成为第十五大官方发展援助国；其中的人道主义援助增长到10亿美元，占土耳其官方发展援助的40%，使土耳其成为第四大官方人道主义援助国。^②

总体来看，伊斯梅尔和达武特奥卢的理念都属于欧亚主义范畴，二者的不同体现在伊斯梅尔是相对温和的欧亚主义者，而达武特奥卢的理念更加激进，具有“新奥斯曼主义”的倾向。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影响的过分强调，挑战了伊斯梅尔时期对统一的身份认同的追求、对世俗主义的辩证理解，以及对西方好恶并存的心态。

结 语

伊斯梅尔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恰逢土耳其联合政府执政，国家机能运转失常，即国家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能、行政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腐败盛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失业问题严重、社会道德沦丧，以及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遭到践踏等。^③20世纪90年代后期，

① Berdal Aral, “The World Is Bigger than Five: A Salutary Manifesto of Turkey’s New International Outlook”, in *Insight Turkey*, Vol. 21, No. 4 (Fall 2019), pp. 71–95.

② *The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port 2013*,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pp. 36–37.

③ Banu Elgü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6.

土耳其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 100%，联合政府难以推出有效政策维持土耳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以至于 2000—2001 年连续发生两次经济危机。^① 为摆脱内忧外患，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伊斯梅尔从土耳其国内教俗关系出发，缓和了“宗教—政治”在土耳其社会中长期对立的局面。伊斯梅尔认为，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是“被压制的群众的形而上的反应”，即 20 世纪 70 年代大资产阶级指使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通过唤起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冲突来阻止所有受压制群众的抱团统一，是特权阶层利用了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冲突来削弱左派运动的影响力。^② 因此，伊斯兰教不再是土耳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阻碍，而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遗产，成为土耳其拓展外交范围和领域的重要基础，也是土耳其“欧亚特质”的重要基础。

土耳其能够真正开始实践欧亚主义是在冷战结束后，1997 年出任外交部部长的伊斯梅尔则是土耳其对外政策中承前启后的欧亚主义者。20 世纪 80 年代，在厄扎尔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土耳其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进入了经济全球化阶段，实现了经济扩张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市场。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务实、多维、积极的政策又被称为“厄扎尔主义”，其在对外政策中则表现为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③ 1992 年，土耳其就已经将中亚和高加索定义为“地缘战略的关键”。厄扎尔认为，加强与邻国的关系一方面可以提升土耳其在

① Emre Alper, “The Turkish Liquidity Crisis of 2000: What Went Wrong,” in *Forthcoming: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Finance and Trade*, Vol. 37, No. 6 (2001), p. 61.

② Ozan Örmeci, “A Turkish Social Democrat: İsmail Cem,” in *Turkish Studies*, Vol. 12, No. 1 (2011), p. 111.

③ Muhittin Ataman, “Özalist Dış Politika: Aktif ve Rasyonel Bir Anlayış,” (《厄扎尔主义的对外政策：一种积极与理性的分析》) in *Bilg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Cilt 7, Sayı 2 (2003), p. 62.

西方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拓展外交空间的唯一途径。与厄扎尔相比，伊斯梅尔更加明确地表达了欧亚主义倾向。首先，土耳其与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之间签订了建造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和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其次，土耳其与叙利亚签署了《阿达纳协议》，赋予了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境内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权利，也是土耳其发起“幼发拉底之盾”“橄榄枝”行动和“和平之泉”行动等越境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武装的法律依据，不过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所谓“反恐”深度由原先的5千米延长到了30千米。直到今天，《阿达纳协议》依然是美国撤出叙利亚之后，土耳其与俄罗斯、伊朗之间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基础。另外，土耳其与俄罗斯在1997年签署了建设“蓝溪”天然气管道的协议，标志着土俄关系的转折。2001年“9·11”事件后，伊斯梅尔建议成立“俄罗斯—土耳其—中亚战略三角”，^①随后与俄罗斯签署了“欧亚合作行动计划”。最后，伊斯梅尔推动土耳其通过了《向非洲开放计划》，但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耳其联合政府治理不善、经济危机频发，以及入盟进程受阻和伊拉克战争，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该计划未能得到有效实施。直到正发党上台，土耳其才逐渐摆脱了90年代经济低迷、政治动荡的局面，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外交政策的执行奠定了物质基础；再加上达武特奥卢“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的推动，《向非洲开放计划》在2005年后迎来了新的转机。

伊斯梅尔对土耳其外交思想和对外政策影响深远，他使土

^① Acar, Özgen, “Ankara – Moskova – Orta Asya Stratejik Üçgeni,” (《安卡拉—莫斯科—中亚战略三角》) *Cumhuriyet*, 11 Eylül 2001. 转引自 Mitat Çelikpala, “1990’lardan Günümüze Türk – Rus İlişkileri,” (《1990年代至今的土耳其—俄罗斯关系》) in *Avrasya Dosyası*, Cilt 13, Sayı 1 (2007), pp. 267 – 298.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以务实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为冷战后的土耳其外交政策找到了发展方向。在伊斯梅尔的影响下，土耳其欧亚主义政策也体现出务实的特征，弱化了其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倾向，为冷战后处于充满不确定性世界中的土耳其外交提供了更多可能。

著（译）者简介

- 王 涛**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
- 龙兴春**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徐以骅**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张 励**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 陈冬梅** 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李 晶**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哲学系暨东亚研究院副教授
- 陈 宇**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 王佳尼** 上海大学文学院土耳其研究中心讲师
- 马启峰**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 唐淑娴**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中南亚研究中心讲师
- 吴波汛** 河北师范大学晏梁学智中心助理研究员
- 姜 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师资博士后
- 潘米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雅博士后
- 刘庭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